



试论甲骨文“城郭”字形之创制年代*

——中华文明起源标准的另一种探索

朱彦民

摘要:殷墟甲骨文突然出现在商代晚期的王室占卜记录中,明显比较突兀,所以关于甲骨文的前身与祖型,一直是学术界追溯的对象和探讨的目标。考古学的进步和大量出土的实物资料,为这一文字探源工作提供了珍贵信息。本文选择代表文明起源标志之一的“城市”为线索,将甲骨文中“城郭”字形,与考古发现的早期城郭形态进行比勘对照,认为甲骨文“城郭”类文字,创制于黄河流域城邑大多呈方形的龙山文化时期。这为文明起源标准的研究,提供了另一种探索的路径。

关键词:甲骨文;城郭;创制年代;龙山文化

中图分类号:K21;K8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5)03-0005-10

成熟且成系统的甲骨文突然出现在商代晚期,委实有些突兀。在此之前,应该有一个漫长的文字起源和早期发展阶段,这是学界共识。于是,由甲骨文上溯汉字起源及其早期发展,就成了古文字学、历史学和考古学界普遍关注的研究课题。

一、早于殷墟甲骨文的商代文字发现

在早商二里冈文化时期和郑州商城时期,其实就已经有了甲骨文的前身和祖型。郑州二里冈期商代早期遗址发现有5片甲骨刻辞,其上所刻之字与殷墟甲骨文基本一致,当属于同一文字系统。

第一片是刻字牛肋骨,发现于1953年4月,是配合位于郑州二里冈的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建设时发现的。牛肋骨略呈圆弧形,在其鼓起的

弧面上,刻有10个字^①:“……又土羊,乙丑贞,从,受……七月。”^②第二片发现于1953年9月,同样是在二里冈工地。该字骨呈扁圆形,为牛肱骨的关节部分,凸起的一面刻有一“出”字^③。第三片发现于1954年4月,仍出土于郑州二里冈。这是一条有小孔的薄骨片,上端刻有一字,但文字难以辨识^④。第四片发现于1989年秋,出土于郑州商城内河南省水利第一工程局的发掘现场。这是一件两端被锯过的动物肢骨,近一端正面有两个刻画文字,两字作“彡”状,刻痕较浅,转折处无棱角,刀锋不甚明显,从两字的结构来看,确是有意刻画而成^⑤。这两个刻画文字与殷墟发现的成熟甲骨文在字形结构上非常相似,据王宇信鉴定考释,此二字可释为“玉弜”^⑥。该字骨发现于二里冈上层时期的地层中,其时代应为二里冈上层。第五片发现于1990年夏,考古人员在郑州商城内的郑州电力学校清理J3外

收稿日期:2024-12-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文明起源重大历史问题研究”(23&ZD267)。

作者简介:朱彦民,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350),主要从事甲骨学、殷商史、先秦社会生活史、书法史研究。

侧的夯土坑H10时,在填土中发现一片刻有文字的残骨片。该骨片呈不规则形状,正面光滑,背面凹凸不平,正面上部中间部位发现有两个刻画文字,作“𠄎”状,与河南省水利第一工程局工地发现的字骨非常相像,同样刻痕较浅,转折处刀锋不甚明显,甚至有一个字是完全相同的。两个工地仅相距数百米^⑦,因此这两片刻画方法和内容均类似的骨片很可能有密切关联。

上述这些刻辞骨片,只是早于殷墟甲骨文的郑州地区的早商甲骨文字信息。此时的文字材料不仅限于甲骨文字,非甲骨文字资料和其他地区的早于殷墟甲骨文的文字材料,比如商代早期的金文、陶文、玉石文字等也发现有不少,甚至可能还有文献中提及的目前尚未发现的简册文字。只是这些早期文字材料,比较分散而且碎片化,并不像殷墟甲骨文那样出土集中、频繁且有系统^⑧。

由此可知,甲骨文并非殷墟时期才开始出现,在此之前,应该有一个漫长的起源、发展和使用时期。那么,中国汉字的源头,究竟能够追溯到什么时代呢?

二、对于夏代及其以前文字的探索

尽管在考古发现中,有早于殷墟甲骨文的早期文字零散发现,但在考释或者描述中国早期文字材料(陶器、玉器刻画符号或文字)时,我国著名古文字学家如于省吾、唐兰、饶宗颐、李学勤、裘锡圭等人,往往都是将这些文字符号与殷墟甲骨文的某些字形进行比照,认为应该是甲骨文中的某字^⑨。当然,这是因为甲骨文是我国目前最早的系统文字,只能拿它作为一个参照系来观察和考释早期文字。

文字本身的功能就是记录过往,传播思想,保存古人的智慧,所以从较早的文字记载中去发现探索更早时代的社会文化,不仅是可取的,而且也是可行的。

(一)考古学文化中的夏代文字信息

关于夏代有无文字,学术界颇有争论。《尚书·多士》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1]即殷人的祖先率先发明了文字,并且有了典册文献。与有了甲骨文的商族相比,夏族也许不是文字

的发明者,所以整个夏代使用文字可能并不普遍。据王玉哲研究,群经诸子所引《夏书》以及《禹贡》《甘誓》绝不是周以前的作品,明代所传“大禹岫嵎碑”,宋人所传的所谓夏雕戈、夏带钩,其上的铭文刻辞,也不是夏代文字,夏代当时还没有文字^⑩。徐中舒等人也同意这一看法,即周代的文字系统基本同于殷商文字,很可能是从商人那里学来的^⑪。

随着夏代考古工作的进展,考古学家根据考古的重要发现对夏代是否存在文字做出了与上述意见不同的判断。在属于夏代文化的偃师二里头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有一些陶器刻画符号,这些符号有20多种,大多数分布于大口尊等陶器的口沿内部。这些刻符中,有的从结构和形态看已经与后来的甲骨文比较接近,似乎隶属于同一系统,因此,有学者就认为这些陶器刻符“应该就是当时的文字”^⑫。如1960年在偃师二里头文化晚期第三段的一个灰坑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刻字黑陶纺轮,其上所刻之字的字形与甲骨文中的“𠄎”字比较相似,所以邹衡认为商朝的文字同夏文字是一脉相承的,基本上属于一个系统^⑬。“二里头文化第三、四期的陶器上出现了多种样式的刻划符号,其中有的应该就是文字。这些文字目前尚未认识,有个别的字,颇似甲骨文,例如𠄎或即‘𠄎’字。我们认为,这种早于甲骨文的文字,应该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一种文字。”^[2]二里头遗址之外,也发现有零星的隶属于夏代的文字。如1981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了一件刻字陶器。该器物为泥质磨光黑陶平底器残片,其外底上刻有一个“𠄎”字,字形像两手相对各持一棒之形^⑭。该字字形与甲骨文、金文中的“共”字字形非常接近,可能是代表器物所属者氏族的徽号。出土刻符陶器的王城岗三期相当于夏代初年,李先登据此认为,夏代已经有了文字^⑮。只是这些有关夏代文字的材料大多是单字孤证,数量极少,且缺乏系统性和关联性,尚不能证明夏代已经广泛使用文字。

对于二里头遗址发现的20多种陶文符号的性质,有学者认为,这些刻符大都在大口尊和卷沿盆的口沿上,是烧成后使用时刻画上的,从字形风格、结构来看,它们与二里冈陶文、小双桥

朱书应该是一系的,不少是可以与甲骨文相对应的,它们是夏代文字无疑^⑩。夏鼐说到二里头文化时也曾言,“它似乎已有文字制度。发掘中有刻画记号的陶片,都属于晚期。记号已发现的共有24种,有的类似殷墟甲骨文字”,但他也承认,这些刻画记号“都是单个孤立,用意不清楚。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3]。而二里头遗址发掘主持者郑光认为:“其中个别有类似文字的,但因都是单个存在,而且与后来的甲骨文、金文的结构有较大的距离,不易确定其为文字。二里头陶器上的刻划符号不属文字系统,而属某种意义的符号系统。”^[4]尽管郑光认为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刻符只是一种记事符号,远非文字,但他并不否认二里头时期可能存在文字^⑪。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是已经进入夏代纪年的龙山文化遗存,所以学界也多将其与二里头遗址、东下冯遗址一样看作夏代的遗迹。1984年在陶寺遗址一座晚期灰坑中发现了有朱书的陶扁壶,壶身书写两个朱书符号“𠄎𠄎”,李健民认为其中之一为“文”字,很可能与夏禹之名“文命”有关^⑫。而罗琨释其中两字为“易文”即“明文”,将其看作是一篇完整的文献,并与《尚书·尧典》类比,认为两字和一个符号(界划)记述了尧的功绩^⑬。张政烺认为扁壶朱书“文”字与大汶口文化陶文和殷墟甲骨文是同一个文字系统,张光直则认为扁壶背面的那两个刻画符号倒过来看可能是“祖丁”二字^⑭。

不过,夏代发现的符号中除“羌”“共”“文”等与甲骨文、金文中的字形相似外,其他符号均尚不能与后世文字相类比。由于这些符号仍与其他地区龙山时代陶器刻画符号一样,孤立存在且不成系统,所以这些符号是不是文字,尚有争议。

(二)甲骨文中关于夏代存在文字的佐证

尽管在二里头文化考古发掘中发现一些与文字有关的刻画符号,但是目前还没有多少考古学证据可以说明,夏代已经有大量使用文字的现象。所以现有的最早成系统的殷墟甲骨文,依然是考察夏代有无文字的重要资料。

就殷墟甲骨文而言,其承载的历史信息包括两个方面:其一,甲骨卜辞所记录的过往历史信息;其二,甲骨文字形尤其是其中属于象形字

的名词字所保留的古代名物的造型信息。

第一个方面,甲骨卜辞记载的历史信息,尤其是商代之前夏代的历史信息,是我们追溯商代之前夏代文字发展演变的有力证据。

比如甲骨卜辞中有“杞侯”(《合集》^⑮13890)、“曾”(《合集》5504、5512)、“土方”(《合集》559、6057、6354、6833、6443)等国族之名,这些都是夏代后裔的封国或商时被商王分封的诸侯,一直保留到周代还继续封侯。甲骨文中还有一些原来就属于夏王朝的诸侯国,如“六”(《合集》8091、9185、9186)、“戈”(《合集》8397、8984、29379)、“雇”(《合集》13925、24347、36487)等,商代夏后归顺商朝,保留着自己的封号与国族^⑯。

甲骨文中多见“西邑”(《合集》7863、7864、7865、9631)。结合传世文献《礼记·缙衣》《尚书·太甲》及出土文献《清华简·尹诰》《清华简·尹至》中的“西邑夏”“西邑”等考证,李学勤认为,甲骨文“西邑”就是夏朝^⑰。蔡哲茂认为“西邑”最早应该就是夏代都邑,在甲骨文中作为祭祀对象,是夏王朝先王亡灵的代称^⑱。蔡运章则认为,甲骨文中的“西邑”是具体的祖先神,即夏代的开国君主大禹^⑲。不管“西邑”究竟所指为何,它保留了夏代的历史信息则是无可置疑的。

甲骨文中大量祭祀卜辞,其中被祭祀对象多为商人的祖先神和先公先王,这些祖先神和先公先王的名讳,均可与传世文献《史记·殷本纪》互相印证^⑳。其中商汤之前的先公如高祖“夔”、“王亥”、“王恒”、“上甲微”、“三报”(报乙、报丙、报丁)、“二示”(示壬、示癸)等,已经进入夏代纪年,这些祖先的名讳应该在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就已经存在,这也是早于甲骨文时代已有文字的一个辅证。

与商人的祖先神一起被祭祀的商代异姓功臣伊尹,是从夏代进入商代的历史人物。蔡哲茂发现在祭祀卜辞中有伊尹与夏桀元妃妹喜共版合祭的现象,他认为卜辞中与伊尹、黄尹合祭的“蔑”即妹喜,妹喜在夏王朝灭亡后嫁给伊尹,成为伊尹的配偶,始得与伊尹一起受到商王朝的历代追祀^㉑。若此说准确,则又是一个证明夏代文字存在的甲骨文证据。

此外,从陈光宇对甲骨文表谱刻辞中的儿氏家族刻辞(见图1)的研究看,由武丁时代的家

族当事人“𠄎”往上追溯十一世到先祖“吹”，每世按三四十年算，“吹”的存在时间也到了公元前1650年左右。和公元前1800年左右的王亥以及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夔一样，都进入了夏代纪年的不同年份。因此他认为这些人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夏代文字“活化石”^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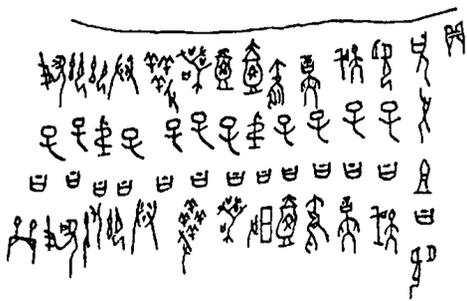


图1 甲骨文中的家谱刻辞(《英藏》^②2674)

(三) 甲骨文中的“夏”字考释与解读

甲骨文中究竟有没有夏代的“夏”字，也是多年来学者们争论的问题。甲骨文中有多、彡、彡等像猴子一样的象形字，王国维释为商人最早的祖先“夔”，即帝喾、帝俊^③。但陈梦家释读字形彡可能为“夏”^④；徐锡台^⑤、詹鄞鑫、葛英会均持此论，释“夔”为“夏”。詹鄞鑫认为：“‘夏’字的形体像人而突出其手舞足蹈的形象，其造字本义正是乐舞的意思。”^[5]葛英会考证甲骨卜辞中祭祀对象“夔”即“夏”字，字形像人吟唱踏歌的优雅之态，亦即古雅字，这个与殷人高祖并卜并祭的大神祇，就是夏后氏大禹^⑥。

此外，也有学者将甲骨文中其他字形释读为“夏”。比如唐兰考释甲骨文彡字为“夏”^⑦。夏绿将“屯”(误为“牙”)字释为春夏秋冬之“夏”^⑧。曹定云将“曾”释为“夔”的一个字形彡(《合集》8984)，训读为“夏”，卜辞中“雀氏夏”，是夏人在商代被奴役的占卜记录^⑨。

不管哪个字是“夏”字，学者们都坚信甲骨文中应该有表示前朝名字的“夏”字。

(四) 夏代及其以前文字存在的考古学考察

第二个方面，即甲骨文字形中属于象形字的名词字所保留的古代名物的造型，其时代的延续性为探索这些文字的形成年代，提供了宝贵信息。

甲骨文中属于名词字之字形，大都属于象形字。这些字形的创制，绝不是在商代甚至晚

商时期。鉴于早期社会发展缓慢，创新能力差，几乎所有名物都有漫长的使用过程，更新迟缓，所以这些象形名词字就有了惯有的长时段延滞状态。因此，甲骨文中的名物字应当都产生于殷墟时代之前，或者早于商代，甚至超越了夏代的纪年。

在这方面，已有学者尤其是一些考古学家在有意识地进行探索与考察。比如甲骨文“爵”字字形作深腹、长流、无柱、束腰、平底的爵的实物形象，这种形制的爵显然是二里头文化或至迟是早商文化的爵，商代晚期已经不见这种造型的青铜爵，由此推测此字可能在二里头时期就已经创制出来^⑩。刘一曼根据甲骨文“爵”字字形，推测“爵”字可能在二里头时期就被创造出来了^⑪。袁广阔则依据晚商族徽文字中部分象形“器物字”，比如爵、钺、尊、爵、豆、觚、盃、鬲、甗、鼓形壶、玉器牙璋等字，其在字形上明显有二里头文化同类器物的造型特征，推测在二里头时期已经进入了这些文字的创造和使用时代^⑫。

还有一些学者，将史前时期的考古器物形制，与甲骨文中表示器物的名词字进行比照联系，对于这类器物文字的创制年代追溯得更远。比如李济就曾发现，甲骨文中的“鬲”字或从“鬲”之字，其字形在甲骨文同时代的小屯鬲形器中找不到标本，反而在早期的标本里找到了相关样品^⑬。刘渊临据此考察考古发现的鬲形器发展演变趋势，在河南龙山文化庙底沟遗址中发现了符合甲骨文“鬲”字形的两件鬲形器。由此推测，这些“鬲”字应当产生在庙底沟龙山文化时代而沿用至殷商时代^⑭。这样的研究，委实开启了由考古学考察文字起源的一个新路径。

苏秉琦将史前陶器造型结合甲骨文进行解读也是这样一个典型。苏秉琦说：“象形字的创造者只能是模仿他们亲眼看到、生活中实际使用的器物形态。因此，甲骨文实物虽出自晚商代人们之手，它们却为我们留下中国文字初创时期的物证。”^[6]苏秉琦认为甲骨文中一些器物象形字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小口尖底瓶末期单唇、宽肩、亚腰的形状。“甲骨文中有两个容器形象，一是‘酉’，一是‘丙’。……这两个字的起源可追溯到五千年前，而且尖底瓶(或称‘酉瓶’)和鬲(鬲)也都不只是生活用品，而可能同

祭祀的神器有关。所以是文化融合产生的文明火花。”^[7]

近年来王晖根据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解读甲骨文中“酉”“鬲”“宫”等字,对这些文字的创制时代进行了探索,也是这样一个研究的赅续。王晖认为,甲骨文“酉”字及从“酉”众字反映的时代是仰韶文化晚期。“丙”及以“丙”为部件构成的字应是仰韶文化晚期之前形成的,其出现时代应在距今5000年之前。甲骨文中不同的“鬲”形字其实是对从庙底沟二期到殷墟小屯时期“鬲”形器物的写实,早的已经到了庙底沟二期和龙山时期,晚的到殷墟时期。甲骨文“宫”及“吕”“𡩉”等字的出现应是具备了两个房间居住建筑的龙山文化时代,至少不可能晚于龙山文化^⑧。

虽然上述学者仅是对个别类组甲骨文字的创制时代进行了追溯,但一叶知秋,这将对文字起源这样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课题,产生推动作用和启发意义。

三、上溯甲骨文“城郭”字形的创制年代

受上述前贤时俊对甲骨文中某类器物名词字产生时代探索的启发,在此我们从甲骨文中与城市相关的一些字的字形出发,结合考古发现的实物形状比勘对照,来判断这些字的创制时间,将文字与城市相结合,以期对文明探源工程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一条新的可行性线索。

(一)城市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标准之一

回顾中外学者关于世界古代文明起源标准的研究,不管是“三标准”“四标准”“六因素”,还是“十项标准”,虽然各家对这些标准的认识和表述略有差别,但大同小异,概括起来主要就是四项:1.文字的使用;2.城市的出现;3.青铜器的冶铸;4.有礼仪性宗教建筑^⑨。“综观世界文明的发生发展史,我们发现文字、城市、复杂的礼仪中心、青铜铸造等确是构成一个文明的最基本标志。”^[8]

而近年国家组织发起并实施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则强调了中国古代文明的独特性和延续性,从而制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华文明起源三项标准: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

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⑩。

不管是原来传统的标准,还是现在新的方案,“城市”一项,均是目前中外学术界认可的文明起源标准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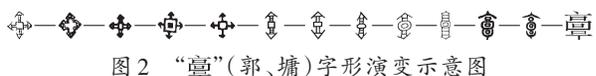
(二)甲骨文、金文中的“城郭”字形

甲骨文中有这样一组字:𡩉(《合集》553、13515、30198)、𡩊(《合集》3417、13514正甲、13516)、𡩋(《合集》13514正乙)、𡩌(《前编》^⑪8·10·1)、𡩍(《京都》^⑫3241)。𡩉字有学者释为“郭”字,也有学者释为“庸”(墉)字^⑬。盖“郭”上古音见母阳部入声铎部字,“庸”上古音喻母东部,东、阳旁转,故“郭”“庸”二字同源音义同^⑭。《说文·臺部》:“𡩉,度也,民所度居也。从回,象城臺之重,两亭相对也。或但从口。”段玉裁注:“城臺字今作郭,郭行而臺废矣。”^[9]⁴⁰³又《说文·土部》“墉”字下云:“墉,城垣也。从土,庸声。𡩉,古文墉。”段玉裁注:“古文墉者,盖古读如庸,秦以后读如郭。”^[9]¹¹⁹⁶因为古代城郭主要是用土夯筑而成,所以《说文·土部》中“垣”“堵”“城”等与城郭相关诸字之籀文都从臺,而小篆则都改成从土。

《释名·释宫室》载:“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10]《礼记·礼运》曰:“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孔颖达疏:“城,内城;郭,外也。”^[11]所以说“郭”“墉”“庸”三字义同。《诗经·大雅·皇矣》:“与尔临冲,以伐崇墉。”毛传:“墉,城也。”^[12]¹¹²³《诗经·大雅·嵩高》:“因是谢人,以作尔庸。”毛传:“庸,城也。”^[12]¹²²¹所以说,“臺”(郭、墉)就是城郭之义。

以上所列城郭字的各种形体正是古代城垣的象形字。𡩉是“臺”(郭、墉)本字,𡩊、𡩋、𡩌则是其省略之简体。其中“口”是四围城墙之形,即“民所度居”之处。甲骨文“𠄎”字(即方圆之方本字)作“口”(《合集》20354),李学勤即读为“城”^⑮。甲骨文中的“口”作为偏旁使用时,绝大多数都表示“城邑”或“区域”,故黄天树认为“口”就是“城”的表意初文^⑯。“口”的上下或四周所从的“𠄎”或“𠄎”诸形,当是城墙上面建筑的门楼,四亭相对或者二亭相对。那么,“臺”字字形确为古代方形城郭有四个或减省为两个城门上望亭观阙(即城门楼)两两相对的形象字^⑰。

“臺”字的金文写法,分别为 (宁臺甗《铭图》³¹³⁷)、 (臺辛鼎《铭图》450)、 (臺戈《铭图》16124)、 (毛公鼎《铭图》2518)、 (国差簠《铭图》19256)、 (昶伯臺盘《铭图》14460)等,虽然笔法有变,但字形结构依然延续甲骨文的写法,也有全写和简形之别,之后中间城围的“口”变成了双道城围的“回”。一直到秦汉小篆时期,《说文》“墉”古文形体、“臺”小篆形体,也都依然保留了甲骨文该字的基本结构(见图2)。所以此“臺”(郭、墉)字容易辨识,也成了学界考证此字形形成共识的原因。



(三)甲骨文、金文“城郭”字形体为方形城郭

在甲骨文、金文中,为何“臺”字作全形的少而多作简形呢?恐怕也不是繁体与简体的关系。唐兰认为:“由于中国文字后来主要是直行,不适宜于横处太阔,所以把两边的城楼省去不画,只有上下两座楼就变为臺字。”^[13]其实,这与甲骨文中一些表示动物形体的字形,多作侧立腾空状,而不是按照实际情况头朝前尾巴朝后四条腿着地,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这是因为,商代的主流文字书写也是简册,正像大家所熟知的战国楚简一样,竹简狭长,不宜书写左右结构形体宽博之字,所以就都做了这样的省改,横宽的字变为竖高,由方形和横体变为纵向竖长字形^⑤。甲骨文、金文的文字书写,受当时主流书写简册形式的影响,也就保留了这样一种文字构形特点。

因为甲骨文主要是依靠青铜刀或碧玉刀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刀笔文字,一些圆转弯曲的笔画不大容易表现,所以往往就刻成了容易成形的方形,比如本义为太阳的“日”字,甲骨文作 (《合集》6)、 (《合集》22069)等形,圆形之物刻成了方形。那么,甲骨文“臺”(, , )中间的“口”刻成方形,会不会也是便于契刻的缘故,而该字所象之城郭本来是圆形的呢?我们认为,甲骨文“臺”和“日”字不同。如果单看甲骨文字形,“臺”之从“口”,确实是用刀刻直画方折的。不过此字在大致同时期的金文中,也作方形而不是圆转之形。比如“宁臺”铭铜甗、“臺”铭铜戈

中“臺”字,分别作、 (见图3)。而金文是铸造之前用毛笔书写的,也可以加工修饰,与甲骨文刻写不一样,它不必把非方折形之物故意铸造成方折笔画。正如张光远主张的,在商代文字中,金文为主流的正体字,而甲骨文则是简化的俗体字^⑥。相比而言,商代的金文表现的是更浓的象形意味,甲骨文则简化得多。既然早期金文中“臺”字中的“口”就作方形的城围形状,那么,该字所象形的古代城郭形制必定也就是方形的了,甲骨文“臺”(, , )所表现的方形城郭状态,当是对历史的继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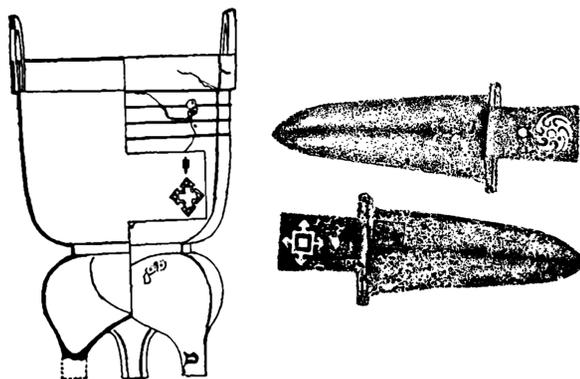


图3 “宁臺”铭铜甗(《铭图》3137)、“臺”铭铜戈(《铭图》16124)

(四)甲骨卜辞中的建城辞例

甲骨卜辞中常有与“臺”相关的辞例,多与城邑或建城有关。比如:

- (1)癸酉卜,設贞:令多奠庇尔臺?(《合集》6943)
- (2)辛卯卜,設贞:基方缶乍(作)臺,不崇弗咎?(《合集》13514正)
- (3)口丑卜,宾贞:句臺于丁? 己酉卜,贞:句臺于丁,不? 二月。癸丑卜,宾贞:于雀臺?(《合集》13515)
- (4)辛酉卜……帚(妇)旃……臺……(《合集》13516)
- (5)癸卯卜,宾贞:将臺于京?(《合集》13523)
- (6)……令取臺……?(《合集》20570)
- (7)口未卜,扶,令般取臺人?(《合集》20571)
- (8)乙亥子卜,丁延于我臺?(《合集》40874)
- (9)乙丑子卜贞:子商乎(呼)出臺? 乙丑子卜贞:余又(有)乎(呼)出臺? 子它乎(呼)出

章? (《京都》3241)

(10) 立邑章商? (《甲释》88)

(11) 甲申卜, 我于西, 多以用人? 我于西? 七月。(《库方》1507、1562)

“作章”一语, 与甲骨卜辞中常见的“作邑”意思相同, “于雀章”“章于京”“延于我章”“立邑章商”则是指在某地某处(“雀”“京”“我”“商”都是地名)建筑城垣的占卜。对于商王朝而言, 建城作邑当是非常重要的建设工程, 因此才会常见于卜辞。

(五) 商代城邑形态与“城郭”字形的远源

由此“章”字形的启发, 学者们往往将这一城郭形态与考古发现的商代几个主要都城如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殷墟都城进行比照而观^⑧。其实, 商代这几个不同时期都城的城郭形态, 都与“章”字形中方形城郭“口”并不吻合, 殷墟都城甚至连城墙都没有。

如果严格从甲骨文字形而论, 后来发现的属于中商文化的洹北商城、属于二里冈时期的焦作府城城址与远在湖北黄陂的盘龙城的城郭形态, 倒是与“章”字原始字形“𠄎”更为契合。尤其是盘龙城方形城郭四围城墙上各有一个城门^⑨, 推测四个城门上各建一个城门楼, 正是甲骨文“𠄎”字形最好的实体例证。

然而我们知道, 这个时期早已有了文字, 甲骨文“章”(𠄎)字应该不是依照这些城郭形态创制的文字。追溯此字的创制时代, 应该着眼于比商代更早的早期城市形态。在属于夏代纪年的二里头文化中, 也发现了与甲骨文“章”(𠄎)极为近似的刻画符号𠄎(未见编号), 发掘者杜金鹏就将其与甲骨文“章”(𠄎)相比附^⑩。袁广阔等人也称之为“城墉”符号, 认为此符号或是甲骨文“𠄎”的简体^⑪。因此推测这个字形, 应该在早于二里头文化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了。

(六) 龙山时代应是甲骨文“城郭”字形的创制年代

当然, 这个时代也不能追溯得太远, 因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文化时, 有城垣的城邑非常少, 大多数遗址为环壕聚落, 且形制都为近圆形。到龙山文化时期, 才出现了大量城邑建筑, 也颇有一些城郭形制与甲骨文“章”(𠄎)字相仿。

专门研究先秦时期城市的学者们, 也为这

个学术指向提供了学理基础。卢连成指出: “方城实际上脱胎于史前社会原始聚落中的环形壕沟, 城体也是基于军事和防御的方便而呈方形的。”^[14]许宏认为仰韶时代为“环壕时代”, 即城址或者聚落村寨的形态为环形; 龙山时代“黄河中下游以外的区域也未观察到由圆形转为方正的迹象”^[15], 但黄河中下游城址形态却出现由圆形转为方正的迹象^[15]。赵辉、魏峻也说: “方形几乎是中国历史上城市建设规划上的一个根本思想或原则。但细审各地的情况可知, 城址平面从圆演变为方的线索比较清晰的是中原地区。”^[16]李鑫在总结龙山文化时期城址形态时同样强调: “形状较为规则的城址主要分布在中原和山东地区。中原地区主要为长方形, 山东地区城址的主要形状则是圆角长方形。形状不规则的城址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17]由上述诸家观点来看, 黄河流域早期由聚落到城邑的发展, 有从圆形环壕向方形城郭转型的趋势。

由此我们推断, 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的方形城堡, 应当就是甲骨文“章”(𠄎)字形依照象形的原型。也就是说, 表示城郭本义的“章”(𠄎)字, 发端于龙山文化时期。这个典型的城郭形制面貌, 可以举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正方形)、辉县孟庄城址(近方形)、新密古城寨城址(方形)与山东日照尧王城城址(长方形)为最佳代表。这个时期的方形城郭较为多见, 其中属于长方形(或近似长方形)的城郭遗址, 有河南鄆城郝家台、新密新砦龙山城、登封王城岗大城、平顶山蒲城店、温县徐堡、博爱西金城, 山西陶寺早期城址, 安徽固镇垓下城, 山东阳谷王家庄、阳谷景阳冈、阳谷王集、阳谷皇姑冢, 湖北鸡叫城、石家河、阴湘城、马家垓、叶家庙, 浙江余杭良渚, 安徽怀宁孙家城, 四川都江堰芒城、郫县古城、崇州紫竹城等。正方形城郭遗址有河南登封王城岗小城西城、辉县孟庄古城, 山西陶寺中期城址, 山东滕州西康留城址、滕州尤楼城址、临淄田旺城址、邹平丁公城址、日照边线王小城、边线王大城, 湖北应城门板湾城址、安陆王古溜城址等。而圆形和椭圆形的城郭, 极为少见, 只有湖南澧县城头山城是圆形, 山东茌平教场铺城和五莲丹土城、湖北城河和陶家湖城为椭圆形。不规则城址则更为少见, 多分布于

地理条件受到限制的地方,需要依地形而建^⑤。应该说,龙山时期方形城郭形制代表当时建城筑邑的一种广泛流行的社会风尚,在黄河流域中下游的中原地带更是如此。

尤其是1979年、1980年经过考古发掘的距今已有4500年的属于龙山文化时期的平粮台城址,规划严整、造型方正、中轴对称、布局合理,拥有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完备的城市排水系统,在中原龙山文化几座城址中是时代较早,也是保存最好的城邑,可以说是龙山文化时代城址的代表。因此有学者据此城址判断此地龙山文化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状态^⑥。

就平粮台城址形制而言,它也被称为方城鼻祖^⑦。城址平面呈正方形,每边城墙长约185米,城内总面积为34000多平方米。西南城角保存最为完整,外角略呈弧形,内角较直。东、南两侧城墙破坏较大。现存城墙顶部宽度为8—10米,推测原来宽度可能在9.8—10.2米之间,底部宽约13米,残高3米多,推测原来高度应不低于6米。如此高大的城墙使得平粮台古城拥有了当时最有效的防御体系。城墙采用版筑和堆筑法建成,即先用小版夯筑宽0.8—0.85米的土墙,然后在其外侧逐层呈斜坡状堆土,夯实,加高到超过墙的高度后,再堆筑出城墙的上部。平粮台城址四面城墙应该各有城门。北城门和南城门已经做了考古发掘。北城门缺口宽2.25米,位于北城墙正中稍偏西处。南城门位于南城墙正中,门道路土宽1.7米,两侧有门卫房的遗存。城门两侧各有一组对称建筑遗址(编号F13、F14),用土坯垒砌,房门相对,推测为城门门卫房^⑧。由此可以推测,城门上应该还有可供瞭望看守用的城门楼,只是随着岁月的推移,城门楼塌毁而成城门缺口。

虽然我们看不到平粮台古城城门楼的形状,但是可以参考广州发现的汉代仿古明器“陶城府”形状推想其模样:“陶城府一件,全高三五公分,成方形,四壁微向外斜,上长宽四三公分,下长宽三八公分。前后有高门,每门各二扇。上面各立望楼一座,四隅之上有像角楼模样的小亭……”^[18]如果说,“陶城府”时代比较晚近,那么根据《考工记》复原的理想化的周王朝都城形状(见图4),其参考价值可能更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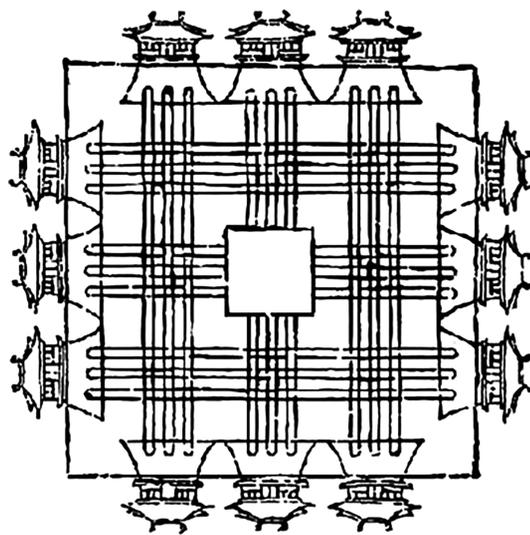


图4 《考工记》中理想化的周都城形制^⑨

因此,虽然我们不敢说甲骨文“臺”(臺)一定是按照平粮台古城形制创制的,但极有可能是依照与此类似的龙山文化时期典型的方形城邑形象,“随体诘屈”而“画成其物”的象形字。也就是说,甲骨文“臺”(臺)字形,保留了进入文明阶段的龙山文化城邑的面貌,也为文明起源标志之一的“城市”留下了一个见证历史的文字“活化石”。

同样地,与“臺”字相关的另一些字,比如本义表示“城”意义的甲骨文“成”字:𠄎(《合集》423)、𠄎(《合集》949)、𠄎(《合集》33349)等,本义表示“国”意义的金文“或”字:𠄎(保卣《铭图》13324)、𠄎(𠄎钟《铭图》15633)、𠄎(何尊《铭图》11819)等,都包含了方形城郭形状的“口”,而且这两个字都在城郭(口)之外,又加上了武器,“成”字从戊(钺,一说从戊)从“口”,“或”字从戈从口,都是用武器保卫城邦的意思,所以这些字的创制时代,既要考虑方形城郭出现的时代,又要考虑青铜武器使用的年代,自然石器时代(包括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期)就会被排除在外,青铜时代的可能性就会更大。而龙山时代正是已进入文明起源的历史时期^⑩,不仅有了文字的使用,而且也有了城市的建筑,更有了早期青铜器的铸造。这都为这些“城郭”字形创制于龙山时代,创造了条件,提供了证据。当然,“成”(城)、“或”(国)这些字的创制年代考证,可能涉及与文明起源同样重要的早期城邦国家的起源问题,这需要对另外的相关资料进行审视

和深入研究。

注释

①④均见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郑州二里冈》,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7页。②关于这片甲骨文的释读,学界有不同的观点,在此从裴明相。参见裴明相:《略谈郑州商代前期的骨刻文字》,载《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1985年增刊。③⑩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7页,第338页。⑤⑦均见宋国定:《1985—1992年郑州商城考古发现综述》,载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1985—1992)》,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⑥转引自杨育彬:《华夏古代文明的丰碑》,载吕伟达主编:《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一百周年论文集》,齐鲁书社2000年版。⑧朱彦民:《商代社会的文化与观念》,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5—68、105—139页。⑨参见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2期;唐兰:《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文物》1975年第7期等。⑩王玉哲:《夏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先秦史学会编:《夏史论丛》,齐鲁书社1985年版。⑪徐中舒、唐嘉弘:《关于夏代文字的问题》,载《夏史论丛》。⑫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编:《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21页。⑬邹衡:《试论夏文化》,载《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73页。⑭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第78页。⑮李先登:《试论中国文字之起源》,《天津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⑯⑰杜金鹏:《关于二里头文化的刻画符号与文字问题》,《中国书法》2001年第2期。⑱白云翔、顾智界整理:《中国文明起源座谈纪要》,《考古》1989年第12期。⑲李健民:《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2001年1月。⑳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期,2002年1月。㉑高炜:《陶寺出土文书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3年1月。㉒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78—1982年出版。文中该书均简称为《合集》,所引卜辞以所在甲骨编号标注。文中所引卜辞释文,均为综合各家观点后,作者自己的观点。㉓杨升南:《商代甲骨文所见夏代诸侯》,《四川文物》2014年第3期。㉔《李学勤:确定了!甲骨文上的“西邑”,就是夏朝》,搜狐网,2019年2月26日, https://www.sohu.com/a/297616648_523187。㉕蔡

运章:《清华简“西邑夏”与甲骨文“西邑”》,《洛阳日报》2020年12月16日。㉖⑳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载《观堂集林》卷九,中华书局1959年版。㉗蔡哲茂:《殷卜辞“伊尹舅示”考——兼论它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8本第4分,1987年版。㉘陈光宇:《从甲骨文推测汉字起源与发展的模式》,“道客巴巴”,2017年3月20日, <https://www.doc88.com/p-801960217054.html>。㉙李学勤、齐文心、[美]艾兰:《英国所藏甲骨集》下编下册,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98页。文中简称《英藏》。㉚徐锡台:《殷墟卜辞中“𠄎”字考》,《人文杂志》1984年第5期。㉛葛英会:《夏字形义考》,《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1期。㉜唐兰:《殷虚文字记》,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4页。㉝夏渌:《释甲骨文春夏秋冬——商代必知四季说》,《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5期。㉞曹定云:《古文“夏”字考——夏朝存在的文字见证》,《中原文物》1995年第3期。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页。㊱刘一曼:《考古学与甲骨文的释读》,《殷都学刊》2019年第1期。㊲袁广阔:《观迹定书·考古学视野下夏商文字的传承与发展》,《光明日报》2021年5月12日;《甄器尚象:夏代文明之光——二里头遗址陶器中的夏文化信息》,《光明日报》2023年7月26日。㊳⑳刘渊临:《甲骨文中的“鬲”与“甗”》第捌节“附论中国文字的起源”,《“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3本第4分,1971年版。㊴王晖:《从甲骨金文与考古资料的比较看汉字起源时代——并论良渚文化组类陶文与汉字的起源》,《考古学报》2013年第3期。㊵白云翔、顾智界整理:《中国文明起源座谈纪要》,《考古》1989年第12期;白云翔、顾智界:《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纪要》,《考古》1992年第6期。㊶王巍、赵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主要收获》,《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4期。㊷罗振玉:《殷虚书契前编》,日本京都东山学社1932年版。文中简称《前编》,所引甲骨以编号标注。㊸[日]贝冢茂树:《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藏甲骨文字》,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9—1968年出版。文中简称《京都》,所引甲骨以编号标注。㊹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941—1948页。多数学者包括笔者认为此字乃是摹状城垣形态之象形字。㊺王蕴智:《说“郭”“墉”》,《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㊻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9页。㊼黄天树:《甲骨金文论集》,学苑出版社2014年版,第219页。㊽方继成:《试论城阙的起源和发展》,《人文杂志》1958年第5期。㊾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文中简称《铭图》,

所引皆以铜器编号标注。⑤③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403页。⑤④游顺钊:《古文字书写纵向成因——“六书”之外的一个探讨》,《中国语文》1992年第5期。⑤⑤张光远:《商代金文为正体字甲骨文为简体字说》,《中国书法》2009年第9期。⑤⑥屈万里:《小屯甲编考释附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1年版。文中简称《甲释》,所引卜辞以甲骨编号标注。⑤⑦[美]方法敛、白瑞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简称《库方》,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所引卜辞以甲骨编号标注。⑤⑧卢连成:《论商代、西周都城形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3期;曹鹏:《商代甲骨档案所载的城郭》,《档案》2020年第11期等。⑤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⑥①袁广阔、马保春、宋国定:《河南早期刻画符号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21—222页。⑥②李丽娜:《龙山至二里头时代城邑研究》,郑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87—89页。⑥③曹桂岑:《淮阳平粮台城址社会性质探析》,《中原文物》1990年第2期。⑥④李含飞:《方城鼻祖,形制完备——平粮台龙山古城环境设计浅论》,《装饰》2013年第5期。⑥⑤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⑥⑥图片引自聂崇义集注:《新定三礼图》,载郑振铎编:《中国古代版画丛刊》之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0页。⑥⑦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张海:《“龙山时代”: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段》,《学习时报》2021年1月1日。

参考文献

- [1]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M].陈抗,盛冬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429.
[2]邹衡.夏文化的研究及其有关问题[M]//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续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4.

- [3]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20.
[4]白云翔,顾智界.中国文明起源座谈纪要[J].考古,1989(12):1110.
[5]詹鄞鑫.华夏考[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5):13.
[6]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89.
[7]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24.
[8]陈星灿.文明诸因素的起源与文明时代:兼论红山文化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J].考古,1987(5):459.
[9]许慎.说文解字注[M].段玉裁,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
[10]刘熙.释名[M].愚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20:78.
[11]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2009:3062.
[12]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2009.
[13]唐兰.从河南郑州出土的商代前期青铜器谈起[J].文物,1973(7):5.
[14]卢连成.论商代、西周都城形态[J].中国历史地理研究,1990(3):156.
[15]许宏.大道中国“围子”的中国史:先秦城邑7000年大势扫描(之一)[J].南方文物,2017(1):14.
[16]赵辉,魏峻.中国新石器时代城址的发现与研究[M]//古代文明:第1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32.
[17]李鑫.商周城市形态的演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50.
[18]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东郊东汉砖室墓清理纪略[J].文物参考资料,1955(6):66.

Discussion on the Creation Time of the Oracle Bone Script Character for “City”: Another Exploration of the Standards for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Zhu Yanmin

Abstract: The sudden emergence of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in the late Shang Dynasty’s royal divination records is rather abrupt. Therefore, the predecessors and ancestral forms of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have always been the interest of academic research. The advancements in archaeology and the discovery of a large amount of unearthed materials have provided valuable information for this explor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city”, a key marker of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and uses it as a focal point for analysis. By comparing the “city” characters 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with the early city wall forms discovered through archaeology, the study argues that the characters of “city” 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were created during the Longshan Culture period, when most of the citi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were square in shape. This also provides another path for the study of the standards of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Key words: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city wall; creation time; Longshan culture

[责任编辑/知 然]